

# みんなくりポジトリ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 Research Issues of Chinese and Hakka in Kolkata, India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20-03-27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潘, 美玲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a href="https://doi.org/10.15021/00009525">https://doi.org/10.15021/00009525</a>

## 印度加爾各答華人與客家研究議題評析

### Research Issues of Chinese and Hakka in Kolkata, India

潘 美玲  
PAN Mei-Lin

**Abstract:** Since the 17th century, Chinese immigrants have lived in India, mainly in Tangra (Dhapa) area, Kolkata (Calcutta) City, West Bengal. Hakka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at population, with leather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ing being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ocal ethnic industry. The immigrant community, which has been around there for more than 200 years, has gone through the period of British colonial rule and the history of India's independence as a democratic country. With the change of India's regime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migrant community and local Indian society has shown different patterns. Especially in 1962, the war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triggered the migration trend of Chinese immigrants from Kolkata to other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This article reviews and analyses English and Chinese research literature about the immigrant community published since the 1960s, which includes immigration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ethnic economy, and relations with the Indian Society. It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ian Chinese / Hakka immigrants in India and the common issues of studies on overseas Chinese / Hakka presented by this community study. Final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an Chinese / Hakka immigrant community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context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immigrants' home country and the immigrant society. Similarly, academic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on Indian Chinese / Hakka people must also be placed in the context of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allow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issue to be discerned.

## 1 前言

根據史書的記載，追溯華人到印度的歷史，是在兩千多年之前中國的兩漢時代，《史記》的〈大宛傳〉中，張騫出使西域後，向漢武帝報告，提到當時蜀地（四川省境內）的商賈能夠運銷土產到「身毒」，通過現今滇緬的陸路，進行與印度的貿易往來。印度是佛教的發源地，當時許多學問僧為了蒐集梵文經典與研習佛法，遠赴該地求學。並將印度佛教傳入漢地，逐漸發展成漢傳佛教。唐代的玄奘歷經18年的求法之行，就其見聞寫成12卷的《大唐西域記》，從現代學術的角度而言，這部十餘萬字的巨著，堪稱玄奘的中亞印度田野民族誌，其嚴謹與詳實的程度，得以補充印度孔雀王朝和阿育王時代在歷史文獻的空白，

成為瞭解中古印度史和佛教史的重要材料。從這些歷史記載當中，可見漢地與印度的交流，即使在地理阻隔的交通條件下，長程的商業貿易之需求以及學佛求法的驅使，持續帶動當時人群的跨界流動。

近代華人移民印度的歷史，則集中在英國殖民印度的時期。從17世紀以來就有華人移民印度，主要集中在西孟加拉省（West Bengal）加爾各答（Kolkata，舊稱 Calcutta）的塔壩（Dhapa 或稱 Tangra）地區，客家人在人口組成當中佔有多數，並以皮革的生產製造形成具有族群特色的產業。在1900年之後，中國內部的社會動亂和戰爭是影響印度加爾各答的華人移民人口變遷的因素。1911年到1961的五十年間，有兩波移民潮都緣於中國內部的戰亂，第一波是1911到1930年間從滿清帝制被推翻，建立中華民國，之後軍閥割據、國共內戰、日人侵華的動盪階段；第二波則從1949年二次戰後中國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展開階級革命社會清算，為避戰亂和共產黨清算而逃到印度的難民，加上原來就在印度打工的華人家屬過來投靠依親，而使得華人社群人口增加近三萬人（潘 2011：98）。但是中國和印度在1962年的邊界戰爭，到1967年的中印戰爭後續期間，印度政府強制驅離，還有自行離開印度者總共將近萬人，使得整個加爾各答的印度華人社區，面臨嚴重的人口外流的情況。

這個已經有200多年的移民社群，歷經英國殖民統治的時期，以及印度獨立為民主國家的歷史，隨著印度的政權改變和社會經濟發展，該移民社群與印度在地社會的關係展現不同的型態。尤其1962年的中印戰爭，更觸發加爾各答華人移民前往歐美等其他國家再移民趨勢。本文將針對1960年代以來，有關該地社群中、英文出版的研究文獻進行評論分析，包括移民特性、文化特質、族群經濟、以及與印度社會的關係等內容，檢視印度華人／客家人的在印度社會移民特質，以及海外華人／客家人研究共同議題。

## 2 「印度華僑」的文獻

華人早在17、18世紀就已經在印度的港口、茶廠等地從事經濟活動，但是早期移民的歷史文獻非常欠缺，因為最早來到印度的華人移工在中印戰爭之後，絕大多數被迫離開印度，移民者多屬於勞動階層，當時又身處戰亂的時代，該社群一直沒有機會進行系統性地文獻保留及移民歷史的書寫。筆者在2007年前往當地從事田野的過程，也發現華人社區變化極大，老者多已凋零或隨著子女外移他國，新生的世代對於其家族的移民歷史所知相當有限。

中文出版的印度華人移民歷史的文獻，是在1960年代中華民國的「僑務委員會」一系列針對各地的旅居僑民概況的叢書：按照出版的時間分別是：《印度錫蘭華僑經濟》（余 1956）；戴子安所編著的《印度華僑史話》（1957）、《印度半島華僑教育》（1958），以及華僑志編纂委員會在1962年所編的《印度華僑志》，總共是四本。

根據國民政府在民國35年（1946）所頒佈的「中華民國憲法」，將僑務列入「基本國

策」，對於僑民在僑居地的國民經濟事業發展，以及教育事業，分別給予保護、獎勵或補助<sup>1)</sup>。而這些官方文獻編寫的時機，即是在當時國共戰爭期間，國民政府為了能夠增加對華僑所在地的生活實況進行瞭解而進行的。

「華僑經濟叢書」的編寫計畫啟動於民國45年（1956），當時將華僑的僑居地分成16個地區，各區自成一冊，其中印度錫蘭（斯里蘭卡）為一區，而有《印度錫蘭華僑經濟》一書。該書提供1950年代「印度華僑」的分佈與從事行業與經濟的概況，作者提到印度華僑的總數並不超過二萬人，與印度上億的人口相比，比例上是微乎其微，但是經濟上卻有實質的表現。其中以皮革業（28%）、皮鞋業（20%）、鑲牙（10%）、木工技工（10%）、什貨業（10%）為最主要的行業，皮革和皮鞋業幾乎屬於廣東梅縣僑民所獨有（余1956：23-30）。

《印度華僑史話》（華僑海外開發史之十一）（1957）、《印度半島華僑教育》（1958）是同一作者戴子安所編著的。序言中說明推進華僑教育的目的，在於「生存互助」、「求國家民族之生存」而能夠隔絕共產黨在海外華僑的勢力，也就是「自由抗暴」的任務（戴編1958：1）。兩書對於印度半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錫蘭）的僑教進行調查，其中將僑社和僑校進行「自由」和「匪偽」的分類與盤點，強調「自由僑校」的教育發展，以抵抗匪偽政權的滲透。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半島華僑教育》一書中，特別指出印度華僑對印度的貢獻有二處：首先是在英國殖民印度期間，透過「東印度公司」招募華工參與英國人所計畫的發展造船業和鋪設鐵路建設，而在1929年之際，印度製茶產業所需，用來裝茶葉的木頭茶箱，皆由華工所製作。在印度獨立之後，西孟加拉省的加爾各答近郊的塔壩地區，所發展的製革工業，更是印度重要的製革產區，並行銷海內外，貢獻印度經濟良多（戴編1958：22-23）。

與上述三本著作分別著重在經濟、歷史、或教育的專題，相比，華僑志編纂委員會在1962年所編《印度華僑志》，在內容與涵括範圍，則算是集大成且最完整。其中許多內容參考自《印度錫蘭華僑經濟》一書，該書的第一章詳述印度的地理與歷史，第二章之後才是華僑移民的歷史，從兩漢開始到近代，也提供了從1931年到1959年的印度華僑人口統計與分佈等。由於出版時間在中印戰爭之前，因此等於記錄了印度華人移民高峰時期的經濟、社團、文教、社會生活等內容。

當時官方所做的調查，旅居華僑的分佈是以籍貫分類為主，《印度錫蘭華僑經濟》分析旅印人口，廣東省籍佔了80%，其中來自梅縣有43%，四邑有30%（余1956：21），《印度華僑志》當中特別將粵籍僑胞分成「客家」、「廣府」（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62：39），但這樣的分類除了在此處提出之外，並沒有在全書其他部分沿用，也沒有說明哪些屬於客家。從《印度華僑志》的資料當中，印度華人主要集中在加爾各答，人群的分類除了官方的籍貫別之外，同時以方言區分職業<sup>2)</sup>，分為來自於廣東梅縣的客家人主要從事皮革製造業、製鞋業、廣東人多從事木匠、湖北人是鑲牙業（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62：42-49）。

雖然是四本著作，但是內容的重疊性很高，特別是近代華人移民印度的先進「楊大釗」

的傳奇故事。同樣的故事也收錄在僑委會所編纂《華僑志總志》內容：「楊大釗，因為無力繳交當地的『入境稅』，未能登陸，幸而尚有一包茶葉，獻作禮物，立受歡迎，並受當地政府酬與一片荒地。此一荒地，在印度人視之，則為棄地，而楊氏得之，正合拓荒理想，當即欣然接受，芟荊斬棘，闢為蔗田；昔日荒蕪，瞬成沃土；為當地擴大生產，繁榮經濟。華僑開發之力，每每如此。印度既有此一嶄新天地，華僑接踵前來者日眾，而印度之墾荒面積，遂為之擴大。…印度人與我僑胞為紀念當日之墾拓先鋒—楊大釗，至今仍名該地為『阿釗坡』，並立廟奉祀」（1978：649）。

來自於廣東省中山縣的楊大釗（Acchi）或稱安儲（Atchew），不見得是真正第一個到印度定居的華人，但他卻是有史料記載的第一人。據英國皇家檔案館的報告顯示，在1778年時，楊大釗向當時英國派駐印度的首任總督 Warren Hastings 租土地在加爾各答開糖廠，並招募華工作為種植甘蔗的勞動力<sup>3)</sup>，1783年12月在自己的糖廠去世，因為他是第一個在印度當地得到官方支持，擁有土地、廠房等財產的華人，被當地的華人認定是移民印度的第一人，但是僑委會在1960年代有關印度華僑的出版品，對於楊大釗抵印的年代並未經過歷史考證，出現謬誤，而後以訛傳訛，例如，誤植為鴉片戰爭之後三年的1845年（戴 1957：9；戴編 1958：12；華僑志編纂委員會 1962：28）或甚至將楊大釗列入太平天國起事之餘眾，而有1860年抵達印度之說（余 1956：13-15）<sup>4)</sup>。

僑委會的出版具有官方特殊的任務，作者有其特定的政治觀點與立場，然而這些官方出版品提供了1960年代之前的印度「華僑」基本資料，得以拼湊當時社會經濟、教育、文化等部分面向，提供瞭解當時印度華人社會的基本材料，成為研究印度華人特定的歷史文本。只是這些叢書在寫作之際，遭逢國共內戰世局動盪，產生了乖謬粗疏的問題，若要引用這些材料，必不能省略反覆查證的程序。

### 3 印度客家華人的研究

#### 3.1 家庭與企業的人類學考察

人類學家歐愛玲（Ellen Oxfield Basu）是研究印度加爾各答客家人的先驅，她在1980年代曾數次在該地進行田野研究與拜訪，1985年完成博士論文，1993年改寫博論增補出版專書 *Blood, Sweat, and Mahjong: Family and Enterprise in 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全書透過民族誌研究的書寫方式，對塔壩地區客家人正值興盛的皮革產業提供第一手記錄與研究分析，當中也整理了印度官方在當地的人口調查資料，和上述1960年代僑委會的出版資料，進行交叉比對。該書的中文翻譯版本《血汗和麻將：一個海外華人社區的家庭與企業》（歐 2015），則直到2015年才收錄在中國的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編輯的《海外客家研究譯叢》中出版。

歐愛玲以傳統人類學的取向，透過此一客家社區的發展，關注華人的家庭企業與家庭生命週期的關係。她指出在有限的地理範圍內同族群從事單一產業的情況下，當產業隨著

市場成長，家族企業也隨著家庭成長而增大規模，此時進行分家並擴張事業時，就不會面臨同一家族成員因為分家而產生內部競爭的問題。但是，一旦面臨的是市場緊縮，處於家庭週期成長的階段，卻無法擴大規模的情況下，人口的外移就對飽和狀態的族群產業，產生了調節的作用。雖然人口外移會影響社區人口的成長，但卻維持家庭企業在原有的規模，不至於因為家庭分化為更小、無競爭力、無法獲利的工作單位，從而能夠維持塔壩華人社區再生產的現狀 (Basu 1985 : 222-228)。

在加爾各答的田野調查期間，歐愛玲意識到自己處在一個以族群劃界的城市，族群扮演當地社會、文化和經濟的關鍵動力。社會群體按照語言、宗教、種姓、階級和地區來源交織而成的「族群基質」(Ethnic Matrix) (Oxfeld 1993 : 32-37)，職業的差異就沿著族群團體而分化，而在當地華人的群體當中，客家人是許多語言群體中的一個，客家人不但和印度人、西方人區隔，也不會將其他華人群體當成自己人 (Oxfeld 1993 : 55-57)，移居印度的客家族群，透過人類學考察的視角也在海外華人的類屬中被區分出來。

### 3.2 被看見的印度華人／客家人

《中國述評》(China Report) 是印度針對中國及東亞各國事務的研究季刊，創立於1965年，就在中印戰爭之後不久，是印度學界對中國事務關注和討論的重要平台。雖然加爾各答的華人社區已經存在了200多年，但印度學術界並沒有給予特殊的關注，甚至歐愛玲在1993年出版了對當地的研究，也沒有引起學術界太多的討論。一直要等到2007年12月該期刊出版了「加爾各答(印度)與中國」的專題 (Special Issue: Kolkata (India) and China)，根據該期客座主編 Tansen Sen 的說法，因為中印戰爭及其後華人被牽連對待的緣故，這個議題對於中國或是印度的學者而言，觸及政治敏感性而不被重視 (Sen 2007)。直到公元2000年之後，全球資本主義往工業新興國家發展<sup>5)</sup>，中國、印度兩國經濟崛起，印度在外交上開始嘗試超越過去中印戰爭的陰影，重新檢視兩國的關係，此時印度加爾各答的華人方成為中印歷史連結的焦點。該專題當中有一篇論文和兩本書評討論加爾各答的華人社區，次年中國在北京發行的《華僑華人歷史研究》將該專輯有關印度的論文都翻譯成中文，

表1 「加爾各答(印度)與中國」論文翻譯對照表

期刊作者	<i>China Report</i> 第43卷第4期2007年12月	《華僑華人歷史研究》第4期2008年12月
Jennifer Liang (梁慧萍)	Migration Pattern and Occupational Specialisations of Kolkata Chinese: An Insider's Story	加爾各答的華僑華人：移民模式與職業特性
Ellen Oxfeld (歐愛玲)	Still Guest People; The Reproduction of Hakka Identity in Kolkata, India	依舊是「客人」：印度加爾各答客家人認同的重塑
Payal Banerjee (帕雅·班納吉)	Chinese Indians in Fire: Refractions of Ethnicity, Gender, Sexuality and Citizenship in Post-Colonial India's Memories of the Sino-Indian War	印度電影中的華人形象：對於四部電影和一部紀錄片的簡要分析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顯見中印兩國藉此建立連結的橋樑。

這三篇研究論文呈現三種不同視角：梁慧萍是出生在印度加爾各答的華人，她在自己成長的社區對耆老進行訪談，回憶當年移民生活的艱辛與社會活動，勾勒當地華人在不同歷史階段的移民類型以及職業型態，包括廣東的木匠、客家的鞋匠和製革匠、以及湖北的安牙工。這些訪談的內容，所呈現的加爾各答華人都只是將印度當成打工賺錢的旅居之地，直到二戰結束之後，因為國共內戰被迫與家鄉斷絕音訊，從此就得在印度安家落戶，移民群中佔有多數的男性單身漢，只能就地尋找婚配對象，她特別指出廣東木匠會娶非華人的女子為妻，但客家人則以「『純正的血統』自豪，瞧不起那些娶『外來人』為妻的人。」(Liang 2007 : 403)，足見加爾各答客家人族群界線相較於其他華人族群更具封閉性。

歐愛玲是美國籍的人類學家，這篇論文其實是她在1980年代在加爾各答客家人社區進行田野材料所書寫的作品，收於1996年出版的專書合輯 (Oxford 1996)。該文指出加爾各答並不是一個文化大熔爐，相反地各族群團體堅守界線且相互隔離，若根據印度的種姓制度，華人從事的工作都不屬於高種姓的職業，特別是客家人的製革業，接觸到動物的屍體，屬於最不潔淨的行業，印度人眼中的客家人等於是種姓的底層，在地理空間上被隔絕在加爾各答城區郊外的沼澤地，就如印度農村的賤民社區般地邊緣。文中結論特別探討客家族群以語言為族群認同的動力，並注意到再移民到加拿大多倫多的現象，只是對於後者著墨較少。

第三篇論文的作者帕雅·班納吉則是印度裔，介紹四部印度人拍攝的影片和由 Rafecq Ellias 導演的紀錄片〈胖媽媽傳奇〉(The Legend of Fat Mama)，都是對照出1962年中印戰爭前後，華人在印度媒體形象的差別。從這幾部影片當中華人所扮演的角色，折射出印度人眼中的族群、性別、情慾、以及公民身份的華人形象。作者觀察出在中印戰爭前後的確有明顯的差別，1962年之前的華人形象多屬正面，但中印戰爭之後的華人形象則是負面，甚至被塑造成危害印度人幸福的角色 (Banerjee 2007)。由英國國家廣播電臺 (BBC) 製播的〈胖媽媽傳奇〉紀錄片，與前面四部影片不同，該片以加爾各答的華人生活為主體，並開了記錄中印戰爭之後華人被監禁等遭遇的訪談先例，該片也同時記錄了華人從印度再移民的現象 (Ellias 2005)。

公元2000年之後在學術場域被看見的印度華人／客家人，透過人類學者民族誌的書寫，耆老的回憶，以及BBC的紀錄片的自述，提供從印度華人／客家人觀點的歷史經驗敘事，而從電影塑造的華人角色，對照出印度社會對於華人「他者」的凝視，以及這種視角如何受到中印兩國關係的好壞而翻轉。

### 3.3 社會變遷與文化創新

《中國述評》(China Report) 的三篇研究論文，如主編所言，是印度試圖對加爾各答華人社區「沒有被探索的連結」(unexplored link) 的初步嘗試，導引印度社會對該社區的注視。一年之後，《華僑華人歷史研究》接力出版印度華人專題，除了翻譯已經出版的三篇

論文和書評之外，另有兩篇中國學者的論文。

張秀明是該期的主編，也是中國移民研究的學者，〈被邊緣化的群體：印度華僑華人社會的變遷〉(2008：6-23)一文，雖然點明印度華人在印度的邊緣社會位置，卻也指出在公元2000年以來印度華人社會，因為與中國開始熱絡的經貿往來，而出現二個方向的變化：(一)人口的雙向遷移，商業貿易的人員往來，新來的中國移民使印度華人數量增加，但不會加入加爾各答的華人傳統社區。(二)中印關係的改善和發展對華人社會產生的影響值得關注(2008：19-20)。張秀明是以國家為單位的框架，指出中印兩國關係的改變，必然促使印度華人社群的人口的改變，至於量變是否對印度華人社區會產生質變，則有待觀察。

事實上，印度華人的文化認同已經因為在地適應，而發展出創新的型態。〈文化認同的傳承與創新：印度加爾各答華人的多元化宗教信仰研究〉一文的作者張幸，觀察到該社區存在著多元宗教信仰，這是移民與在地社會的互動，所發展在文化層面的傳承與創新。當地存在著三個不同的宮廟信仰，創始人分別來自於三個不同的群體：紀念楊大釗的阿釗坡是廣東人所建的，客家人建立了具民間信仰特色的太壽宮，具有印度在地色彩的迦梨女神廟則是在華人家庭長大的緬甸人建成的(張幸 2008：58)。該文提供了當地華人在地適應過程中，所發展出來的多元身份與文化認同特徵。張幸另外也出版了英文寫作的博士論文部分內容，整理紀錄著1960-1970年代的加爾各答華人社群，如何透過教育維持華人移民的文化傳統(Zhang 2010)。

綜合此時印度客家華人的研究，關注在移民社群的維繫，尤其牽涉到移民人口變遷和文化傳承的變貌。這些文獻提供幾個重要的發現：(1)人口外流並非是完全不利的因素，因為和家庭分化週期配合，可以共構家庭企業經營的再生產機制(Basu 1985；Oxford 1993)。(2)當前新增的華人移民為貿易經商人口，對傳統印度華人社區並無直接衝擊，兩者之間並無交集。(3)文化傳承的在地適應與變遷，是移民研究的普遍議題，宗教信仰的創新是移民在地化的指標，而印度華人教育，本身就是多方權力競逐的場域，受到來自於移民母國的政治、中印關係的演變，以及全球化等因素的影響。

### 3.4 客家移民族群經濟與族群關係

然而在公元2000之後，印度加爾各答的都市化發展，範圍延伸到華人聚集所在的塔壩地區，長久以來賴以維生的皮革業，卻因為印度政府最高法院以污染環境的理由，拍板定案裁決搬遷的命令，塔壩地區的客家人意識到面臨社區經濟存續的挑戰，在公元2005年大家集資作了一個中文寫著「塔壩中國城」，英文“Tangra China Town”加上印度文和孟加拉文的大塊看板放在社區的入口處，指示著進入塔壩的方向。歐愛玲雖然是印度華人社區研究的權威著作，之後延伸到再移民的議題，但對於社區產業的變遷，並沒有後續的研究發表。而這些現象的學術研究，卻與在台灣客家族群從隱形到現身的脈絡，產生連結而得以延續，並與之前的文獻成果進行對話。



台灣社會在1988年歷經了客家族群的「還我母語」運動，在2001年成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2年改制「客家委員會」），成為台灣的制度化族群，也開啟了台灣客家研究的學術脈絡，台灣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的經濟社會學者潘美玲，在2007年執行客委會補助的研究計畫：「從他鄉到故鄉：印度加爾各答 Tangra 客家社群的變遷與存續」就蒐集整理上述相關研究文獻，分別在2006年十一月、2007年七月底到八月初，偕同在當地出生的計畫助理進行在地的田野觀察與深度訪談。分別就加爾各答客家族群的移民歷史和身份變遷，成為印度社會少數族群的歷程，以及客家人皮革產業如何過渡轉變為中餐廳的過程，進行研究書寫。

潘美玲從塔壩中國城標示牌的設立，觀察到以客家人為主的華人社群，已經超越在印度社會的隔離與邊緣處境，該社群再現並呈現在印度社會的文化少數族群（ethnic minority）存在的具體事實（潘 2009：94）。她進一步指出加爾各答的客家人作為一個印度少數族群的認同有兩個面向：一方面是被主流社會團體透過排除或邊緣化的過程所構成的「他者指定」，例如種族化成為印度的敵國之民，以及職業上被隔離在種姓社會的邊緣；另一方面則由於保存了客家語言的，宣稱客家「正統」的地位，以及認定楊大釗「開印祖」的歷史與文化的經驗基礎，形成共同屬於一個社群的集體意識，成為「自我認定」的產物。這兩種認定在不同的制度脈絡下對少數族群的身份產生不同程度的作用。也因此加爾各答的客家人在面對印度社會時宣稱自己為「印度華人（Indian Chinese），但又同時相對於包括中國原鄉在內的其他客家族群，凸顯其客家本質的特性，以及塔壩的認同，顯示多重認同共存而不衝突，但卻不能相互化約將其概括為海外華人的身份（overseas Chinese）」（潘 2009：117-118）。

歐愛玲當年從事田野調查研究的時空環境，是1980年代末期皮革業相當興盛的時期，移民分化是家庭企業的生存策略，足以解釋塔壩社區的經濟維繫機制；潘美玲的研究指出當塔壩的皮革業面臨消失的階段，移民海外不見得完全是家庭企業的策略選擇，而可能是產業環境和政策變動下，被迫向外尋求經濟機會的行為，問題不再是選擇移民，而是留下來的可能性。她從族群經濟轉型的角度，塔壩皮廠轉換成中餐廳的過程，以及紀錄皮革製造區改造為「中華美食街」的案例，從族群產業的變遷分析對照出加爾各答客家移民社群的特質，她發現「塔壩的客家社群即使面臨族群產業的轉換，傳統華人家企業經營的文化傳統仍是主要的運作機制，運用族群資源在人力雇用與管理。即使時空條件改變，運作邏輯依然在皮廠轉業到餐廳的過程，以及餐廳的經營中繼續展現。產業雖然產生變遷，但是企業經營形式和族群資源的運作仍然存在，這是變遷當中不變的部分」（潘 2011：80-82）。

雖然加爾各答的華人社區經濟活動的特色，由於從事的職業，在印度的種姓社會制度下成為「被邊緣化的群體」的族群形象，以及在地理空間上與主流社會隔離的現象，已經被學者的研究標示出來（Oxfeld 1993；Sengupta 1993；張秀明 2008），潘美玲則指出這種社會邊緣性的現象，並不能就此概括印度華人社群與當地社會的族群關係。由於華人移

民印度的歷史有200多年，歷經英國殖民時期，以及印度獨立建國的政權更迭階段，在英國殖民印度期間，在港口、茶廠等地從事的經濟活動以廣東人為主的華工，和當時的英國人建立的友好關係，甚至使他們自認比當地的印度人具有更優越的地位，而有意識地自我隔離，並不是被動地被印度社會排擠到邊緣的地位。換言之，當時的早期華人移民與印度社會的隔離是來自於「少數族裔中間人」地位的結果，而不是來自於印度社會對華人的歧視或敵意的反應，因此必須回到歷史脈絡當中，檢視這個華人社群的生活處境與文化傳統，才能理解他們與印度社會的關係形式（Pan 2014；潘 2015）。

#### 4 待探索的「去自然化」的客家婦女角色

客家婦女在客家族群論述當中一直佔有不容忽視的角色。學者羅香林在其建立客家研究論述時，指出客家作為一個民系，有其特性，在他列舉的客家特性當中，客家婦女的能力和地位，列於第二，僅次於「家人各業的兼顧與人材並蓄」。他指出客家婦女「堅苦耐勞」的程度，是無可比擬的：「客家婦女的生活是勞動的，她們的職業是生產的，她們的經營力甚大，而自身的享取卻非常菲薄，她們不但有經濟獨立的能力，而且在家庭經濟社會經濟上，佔著重要的地位」<sup>6)</sup>。這種參與勞動經濟的生產性角色，是客家族群女性的重要性別角色，也構成了客家族群文化建構的重要一環。對客家婦女經濟角色的重視與強調，與客家傳統對女性的「四頭四尾」：「灶頭鑊尾」、「針對線尾」、「田頭地尾」、「家頭教尾」，共同構成了客家族群文化特質中。歌頌客家婦女的勞動「美德」，是展示客家的必要項目。

然而客家婦女勞動的日常，成為客家文化既定的族群特性時，在客家族群產業經濟的研究當中，被當成是一種不變的常數，雖然客家族群產業經濟隨著不同地區，以及不同社會脈絡的條件必定有所不同，但在以產業為主，企業為研究對象的框架之下，客家婦女所扮演的角色，不是被同質化為家戶勞動，就是將之視為附屬的角色，而使得客家婦女所扮演多元的經濟角色，在實際的勞動場域以及經濟領域當中，隱而不彰，對照於客家婦女在客家文化上被重視的程度，兩者之間呈現顯著的落差：出現了「美德」式的歌頌，同時也是「邊際勞動」的處境。

當筆者在2007到2008年間到當地進行田野調查，觀察客家華人如何進行族群經濟轉型的過程，在皮廠與餐館之間，同樣寫著中文招牌的美髮美容院，也相當醒目，更特別的是，這是客家華人婦女經營的事業。主要服務的對象是印度的婦女，而非華人。訪查期間，塔壩大約共有30多家這種美容院，但是規模都不大，看得出所需要的資金和技術門檻都不高。例如已經在美容院工作10幾年的林女士（化名）的美髮技術，是自己以前在別處打工的時候「自己看，看了就剪，慢慢就學起來了」<sup>7)</sup>。這些客家華人美容院維持在家庭式經營的小本生意型態，靠的是經驗，並沒有特別在技術、規模和服務層面尋求突破，可以維持生計，增補家戶收入，但似乎沒有太多獲利空間。儘管只是薄利的服務業，但只要能增加收入，還是一個值得經營投資的事業。例如，張女士（化名）雖然已經開了兩家中餐廳，

也兼做美容院的生意：「1995年的時候，我的朋友，他們要去加拿大，他們的是一個美容店，也把它買下來，也沒有管它。就把它裝飾好之後，就放在那裡，沒有特別留意，可是生意還是有做。因為門太高，所以我就隔了兩層樓，樓上就做美容院，然後樓下就做印度人的餐廳。」<sup>8)</sup>一位經營皮鞋行的年輕人Eric，雖然母親已經移民美國，還擁有一間塔壩的美容院，有僱請員工經營，但她要求Eric每星期都要過去店裡巡視<sup>9)</sup>。

對於加爾各答的客家華人而言，餐廳比美容院需要更多資金以及管理，因此有些還沒有能力開餐廳的家庭，就會考慮從美容院做起，慢慢累積資金。「如果找到好的店面，我的想法是一半拿來開美容院，一半可以賣小吃。讓美容院裡等候的客人，可以買一點東西吃。」這是在塔壩的市場邊賣點心的王先生（化名）對未來事業的規畫，因為他的妻子以前在當地的美容院工作，只是收入不高<sup>10)</sup>。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在加爾各答塔壩客家華人集中地區，結合中餐館和美容院的複合式家庭企業經營型態，將婦女的事業作為擴大家戶所得為手段的方式，漸漸發展為當地華人的一種企業模式。筆者在印度北部省份的西姆拉（Shimla）的旅途中，發現當地唯一的一家中餐館旁邊就是美容院，更巧的是，老闆是上述在美容院工作的張女士的親戚，美容院當然就是他的妻子所經營的。而在美國紐約的皇后區的“Tangra Masala”的印度式餐廳，樓上就是掛著中文招牌的美容院<sup>11)</sup>。當他們離開塔壩之後，卻也將這種經營模式帶到其他國家繼續運作，而成為印度（客家）華人移民的經濟特色。

美容院是筆者在印度加爾各答地區調查所發現的客家婦女經營的企業，雖然不如皮廠和餐廳的獲利，但卻是維持家計，或擴大家戶所得的一種事業，必須仰賴婦女提供的服務，也是客家女性在當地一項普遍的職業，甚至與餐廳成為複合式經營的事業體，也展示了客家華人的婦女對於家計貢獻的程度。如果這個事業不重要的話，上述已經擁有兩家餐廳的王女士，就不必大費周章地附帶經營美容院，而已經移民美國的Eric的母親，何必千里迢迢地在印度保留一個小店。甚至也不會有將這種經營型態，隨著印度華人移民前往的國家複製出現的機會。美容院的招牌在塔壩地區非常醒目，但卻沒有受到應有的注視，包括當地華人以及之前在當地進行的學術調查研究，他們對於客家婦女的經濟角色，維持在傳統的家務勞動，或者協助自家皮廠進行丈量或會計的工作，也就是無酬家屬工作者的角色。即使婦女所經營的美容院並非高獲利的事業，但為何卻一直沒有「被看見」，則呈現對客家婦女經濟角色的「自然化」盲點，這是未來有待探索的議題<sup>12)</sup>。

## 5 結論——研究議題展望

### 5.1 加爾各答城市族裔地景

近十年來印度當地的學者，對於華人移民社區的關注，是隨著加爾各答城市的演進而發展，主要是關懷在地少數族裔文化保存的問題意識。例如 Bose 在2016年有關加爾各答中國城的報導，詳盡地將該地的歷史文化進行描述，特別關注當地華人的自我隱形到現身

的過程，舊中國城在加爾各答城市的發展更新的過程中，如何能夠維繫傳統的文化資產與認同，成為該城市發展要面對的課題 (Bose 2016)。同樣地，印度的地理學者 Biswas 在 2017 年發表了兩篇有關加爾各答華人社區的研究論文，分別是從社會地理學的觀點，針對加爾各答城市的多元族群文化特質，描述華人社群作為該城市的族裔地景組成的內容 (2017a)。另一篇有關宗教實踐與文化認同的論文，在內容上並沒有超越之前的研究，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學者對當地華人是「華裔印度人」(Chinese-Indian) 作為認同研究的對象 (2017b)，也就是說，從印度人的角度，這些華人也是印度公民，如何同時保有傳統的中華文化以及融合印度在地的文化，引發了當地學者的興趣。這是依附在加爾各答城市族裔地景的發展與變遷的脈絡，觸及的是印度社會多元化與少數族群的文化保存議題，而未能與從僑教或海外華人或客家人的研究文獻產生對話。

## 5.2 華裔印度人再移民——認同與比較研究

兩百多年以來，在印度的華人社群並沒有完全被印度社會同化，由於 1962 年的衝突事件，造成離開印度到歐洲或北美等國家的出走潮。然而當他們再移民到其他國家的時候，卻重新發現自己曾經生活過的印度社會的關聯所在，落腳西方社會的新家園之後，「印度華人」的身份反而更加鮮明 (Oxfeld 2005b : 679)。因此有關加爾各答華人的研究隨著再度移民歐美國家，成為學者探究離散認同的對象。例如 Blunt 和 Jayani (2013) 針對曾經住在加爾各答的英國人 (Anglo-Indian) 和華人 (Chinese-Calcuttans)，再移居到倫敦和多倫多的人進行訪談，理解在跨國遷移過程中，城市認同如何成為離散者的家園。

張幸同樣也採取比較研究的方式，以「華裔印度人」移居到中國廣東的四會市和加拿大的多倫多為對象，呈現移民印度的經驗，如何成為這些再移民者的認同，而構成與其他華人移民群體的區別所在 (Zhang 2017)。因此有關客家移民的再移民研究議題，透過比較研究呈現出多元身份與認同的型態，將提供客家研究在族群認同議題的反思。

## 5.3 跨國族群經濟的比較

加爾各答的華人社群沿著族群的界線而發展不同的經濟型態，客家人從事的皮革產業也曾經在印度的經濟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樣的皮革產業也出現在泰國的華人移民社群當中，但是當加爾各答的客家人再度移民到歐美等其他國家之後，並沒有在當地複製皮革的產業。若要進一步解釋這種現象，就得透過移民社群的族群經濟產業的比較研究，理解移民與在地社會的關係共構產生的結果。

此外，華人移民經濟產業的跨國延伸，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例如在加爾各答的湖北人多從事鑲牙業。其淵源來自於印尼爪哇的華人，據說在 1897 年湖北籍華人受業於爪哇歐洲人的牙科醫院，之後在當地開設鑲牙館並擴展成一千多家的華人牙科業。二次大戰期間，印度成為盟軍東南亞的後方，印尼華人部分避離印度而傳入牙醫業，當時全印度有三百多家，加爾各答市內就占了八十餘家 (Liang 2007 : 407-408)。因此，透過族群網絡

跨國擴散產業的現象，也是值得關注的現象，從族群產業跨國拓展的路徑，理解移民社群網絡的連結與特性。

本文回顧從1960年代至今，200多年的印度加爾各答華人社區的相關研究，有關該地社群中、英文出版的研究文獻進行評論分析，包括移民特性、文化特質、族群經濟、以及與印度社會的關係等內容，檢視社群研究所呈現出的海外華人／客家人研究共同議題。呈現這些研究議題如何在不同的歷史脈絡與國際關係成為被關注的焦點，不同的作者立場與研究取向的觀點，而有華人、客家人、華裔印度人、甚至華裔加爾各答人的不同身份，提供客家研究對話與豐富的意涵。近十年來的研究文獻，漸漸發展出針對「再移民現象」和跨國、跨族群等比較研究的取向，深化對於印度華人移民社群的理解，也對當代全球化脈絡的移民理論提供重要的案例與貢獻。

## 註

- 1)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沿革 (<https://www.ocac.gov.tw/OCAC/Pages/Detail.aspx?nodeid=554&pid=2110> 下載日期2018年6月15日)。
- 2) 早期海外華人以「方言幫」和「地區幫」的社會結構為分類基礎，直到二十世紀之後華語在中國普遍流行以及華語成為華文學校教學語言之後才產生改變，但以方言或地區分類的影響仍然在各種聚居地區、社會交往、職業分布、或通婚等模式中展現出來 (李 2003 : 22-26)
- 3) 根據Oxford (1993 : 71-73) 所引用在 *Bengal Past and Present* (Calcutta Historical Society 1909 : 138-139) 的歷史文獻，保留當時楊大釗和英國總督Warren Hastings的來往書信內容與日期標示，楊大釗早在1778年抵達印度是確定的事實。
- 4) 潘美玲 (2015 : 224-225) 另文中已經發現這個錯誤。
- 5) 中國、印度經濟成長率超過10%，同列「金磚四國」的行列。
- 6)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台一版 (台北：南天書局，1992 [1933]) 頁241。
- 7) 林女士訪談記錄，地點：印度加爾各答塔壩的住家，日期：2007年7月29日。
- 8) 張女士訪談記錄，地點：印度加爾各答塔壩，張女士經營的飯店，日期：2007年7月30日。
- 9) Eric 訪談記錄，地點：印度加爾各答塔壩，Eric 經營的皮鞋店。日期：2007年8月2日。
- 10) 王先生訪談記錄，地點：印度加爾各答塔壩，市場的點心攤。日期：2007年7月31日。
- 11) 參見網頁圖片：<http://tangramasala.blogspot.tw/2008/12/menu.html>，下載日期2016年9月6日。
- 12) Oxford (2005a) 針對加爾各答印度的客家社群和故鄉梅縣之間，在不同歷史階段透過嫁娶而進行跨界結盟，並產生維繫族群邊界的效果。就廣義而言，也可視為是針對加爾各答客家社區的婦女研究，但並未觸及勞動或經濟的面向。主要的理論對話是人類學的婚姻研究，以海外 (印度) 客家族群的跨域婚姻現象，所呈現的各種關係型態，質疑傳統認定跨域婚姻而呈現的高嫁模式 (Hypergamy)。

## 參照文獻

### 〈中文文獻〉

李恩涵

2003 《東南亞華人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

戴子安

1957 《印度華僑史話》台北：海外出版社。

戴子安（編著）

1958 《印度半島華僑教育》台北：海外出版社。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

1962 《印度華僑志》台北：華僑志編纂委員會。

1978 《華僑志總志》（三版）台北：華僑志編纂委員會。

歐愛玲 (Ellen Oxfield)

2015 《血汗和麻將——一個海外華人社區的家庭與企業》吳元珍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潘美玲

2009 印度加爾各答的客家移民《客家研究》3(1): 91-123。

2011 印度加爾各答客家移民族群經濟的變遷，廖建裕、梁秉賦（編）《華人移民與全球化——遷移、本土化與交流》pp. 61-86, 新加坡：華裔館。

2015 印度被殖民時期的華人，謝小芬、方天賜（編）《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印關係》pp. 221-236, 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余緒賢

1956 《印度錫蘭華僑經濟》台北：海外出版社。

張秀明

2008 被邊緣化的群體——印度華僑華人社會的變遷《華僑華人歷史研究》4: 6-23。

張幸

2008 文化認同的傳承與創新——印度加爾各答華人的多元化宗教信仰研究《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8(4): 49-58。

### 〈英文文獻〉

Banerjee, P.

2007 Chinese Indians in Fire: Refractions of Ethnicity, Gender, Sexuality and Citizenship in Post-Colonial India's Memories of the Sino-Indian War. *China Report* 43: 437-463.

Basu, E. O.

1985 *The Limits of Entrepreneurship: Family Press and Ethnic Role amongst Chinese Tanners of Calcutta*. Massachusetts, Cambridg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Biswas, D.

2017a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Kolkata: A Case Study on Social Geography.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2(15): 48-54.

2017b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Chinese-Indian Identity among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Kolkat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s* 7(12): 306-315.

- Blunt, A. and B. Jayani  
 2013 Home, City and Diaspora: Anglo-Indian and Chinese Attachments to Calcutta. *Global Networks* 13(2): 220–240.
- Bose, K.  
 2016 Invisible Identities, Uncertain Futures? Upholding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Kolkatas Chinatown. *Marg: A Magazine of the Arts* 67(3): 34–45.
- Calcutta Historical Society  
 1909 *Bengal Past and Present, Journal of the Calcutta Historical Society* 1909.
- Ellias, R.  
 2005 *The Legend of Fat Mama* (Film). Kathmandu: The Southasia Trust.
- Li, K.-Y.  
 2006 *The Palm Leaf Fan and Other Stories*. Toronto: TSAR Publications.
- Liang, J.  
 2007 Migration Pattern and Occupational Specialisations of Kolkata Chinese: An Insider's Story. *China Report* 43(4): 397–410.
- Oxfeld, E.  
 1993 *Blood, Sweat, and Mahjong: Family and Enterprise in 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Still 'Guest People': The Reproduction of Hakka Identity in Calcutta, India. In N. Constable (ed.) *Guest People: Hakka Identity in China and Abroad*, pp. 149–175.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a Cross-Border Hypergamy? Marriage Exchanges in a Transnational Hakka Community. In N. Constable (ed.) *Cross-Border Marriages: Gender and Mobility in Transnational Asia*, pp. 17–33.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5b Chinese in India. In M. Ember, C. R. Ember, and I. Skoggard (eds.) *Encyclopedia Diasporas: Immigrant and Refugee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pp. 673–679. New York: Springer.
- Pan, M.-L.  
 2014 The Changing Character and Survival Strategi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India. *China Report* 50(3): 233–242.
- Sen, T.  
 2007 Kolkata and China: Some Unexplored Links. *China Report* 43(4): 393–396.
- Sengupta, S.  
 1993 Marginality and Segregation: A Concept of Socio-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Urban Setting. *Man in India* 73: 41–47.
- Zhang, X.  
 2010 *Preserving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Education: The School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Kolkata, Ind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7 Study on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Chinese-Indian in Kolkata, Sihui and Toronto. *Identities* 24(3): 237–253.